

读懂父亲的一生

袁方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家父已驾鹤西去36年,今年年底是他一百三十周年诞辰日。为此我们姐弟商定写一篇怀念文章。此文由我执笔,两位姐姐修改而成。

在我们眼中,父亲是一个勤奋工作、平易近人的教师,在家言语不多,从不宣扬自己的工作成绩,因此,对于他的学术成就,我们知之甚少。直至“文革”结束后,通过1982年庆祝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和1983年地质界为袁复礼90寿辰举行庆祝会的盛况,尤其是中国地质大学1993年出版的《桃李满天下——纪念袁复礼教授百年诞辰》一书,读了几代同事和学生的纪念文章,从他们的切身感受中,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具体教学工作、学术成就和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精神,深受感动,也才知道为什么每年新年元旦和春节,有那么多批老学生来家问候。

2000年前后,我们姐弟陆续退休,有限地对尘封了三四十年的“新疆工作室”散存资料进行清理,在一个书柜中找到一张2米多长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旅行路线总图》,1:200万比例尺,推测是父亲1934年编成,由绘图员李士杰、汪纯明以晕渲法绘法清绘的。图上标出了考察队大队及中方七名团员考察路线和矿产、化石、考古地点等,是一份从未见过的珍贵的总结性图件,于是我们决定把它捐给地质博物馆作为历史资料保存,又把该图的缩微图截成11幅,放大图载于《西北科学考察的先行者——地质学家袁复礼的足迹》一书前方,并以该书参加了2007年中瑞两国合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八十周年纪念展”之学术研讨会。那次展览,瑞方展出了版型统一的56册考察报告、13册游记和一套珍贵的纪实电影。

父亲对地形图非常重视,认为它是表现地质学成果的载体,也是一切科学工作和国防的基础。早年考察时,他亲手测绘各种地形图,诸如:仰韶村遗址地形图(1:4000),1:1万至1:5万的详查地形图、路线图、地质剖面图,而缩绘的1:50万至1:100万的小比例尺图则能提供全貌或方便随文刊载。西北考察团期间,他作为代表团团长多方搜集有关的地图资料,返北平后的1933至1936年间编撰了“新疆1:50万地形水系图”16幅(北疆9幅,南疆7幅),亦由李士杰、汪纯明以晕渲法清绘,准备提供给中方团员及后来人当作底图使用,惜面临日寇侵华危机无法印刷,直到1944年在昆明时,才托人在美国印制了300份。该图在解放后发挥了作用,一部分于1949年送解放军总参谋部供进军新疆使用,1951年又把该图50套送交中科院副院长陶孟和(由于195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结束工作,明确科考研究交中科院接收)。出于对地形图的重视,1932至1937年父亲任清华大学地质学系主任期间,还亲自讲授过“地形测量学”“地球投影”“地质制图学”“地形地貌学”等课程。另,1950年父亲把侵华日军遗弃的朝鲜中部地形图一套(1946年在北平卖花生的小地摊上购得)献给总参谋部供志愿军使用;1951年签署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后,政府组织进藏地质工作队,父亲把赫定修订过的1:20万全套西藏地形图送给队长李璞,还把珍藏的1:100万美军航空测量地形图和刚收到不久的Norin(那林)著《西藏西部一喀喇崑仑地质志》借给加入工作队的助教朱上庆使用,这是当时唯一的一件件资料。可见父亲对地形图的重视,以及盼望祖国强大的迫切心愿。

早年听母亲埋怨,父亲在编新疆地形图上花费精力过多,影响了自己的考察成果整理和发表。其实,父亲在随时代变迁和工作变动后,总是先投身新任务,再抽空整理研究西北考察资料。抗日南迁中丢失了他精选的十几箱标本(包括磨好的岩石薄片400片),致使研究中断八年。幸好近百箱采集品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沈兼士教授辗转于辅仁大学地下室才得以保存,抗日胜利回北平后,父亲在清华大学重新开始了整理研究。由于1950年“协会”结束工作,明确西北科考之研究交中国科学院接收;应父



▲ 袁复礼野外考察标本



▲ 袁复礼地质考察前测绘地形图,192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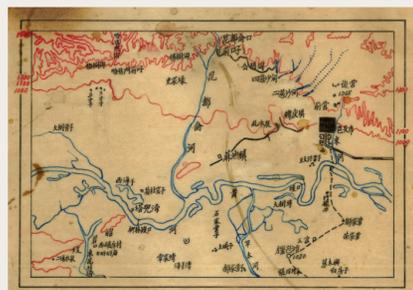
▲ 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纪》卷上



▲ 袁复礼野簿合集(部分)



▲ 袁复礼论著合集(部分)



▲ 袁复礼绘制包头周边图



▲ 由新疆推轮记里至绥远

亲要求,考古所派杨圣泉、杨秋涛两位先生前来协助对各类标本清理造册、誊写及绘图等工作,并把植物化石、动物化石、考古采集品连同其产地、产状、附图等说明资料,一并分类装箱,分别送往中科院下属的各研究所提供研究,只留下少数充实校内博物馆和实验室陈列。又因1952年内系大调整,迁至北京地质学院后,学院为父亲保留了一间“新疆工作室”,故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58年才多次分批移交完成,两位杨先生离去。唯独岩石标本全部留下继续研究。

父亲在1948至1956年期间,发表过五篇对北疆,一篇对绥远的地质、地层、构造、地质运动等方面的总结性文章。《新疆准噶尔东部火山岩》一文迟至1983年才发表,其经过细节我们直到最近才读懂。这得益于近年来新疆师范大学征集了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家属捐赠的先人著作、野外记录

簿、图件、照片等大量原始资料进行研究,这两年我们也与北大朱玉麒教授在网上参与了对父亲的资料解读。究一斑而窥全豹,部分涉及新疆岩石标本采集编号的“野簿第七册”(1929年,160页),和两大袋不完整的初稿(蒙面标有[火山岩分带研究]、妥善保存、1963等字样,共86页),便可见数百块岩浆岩标本及薄片的编号、产状、肉眼描述、薄片鉴定、岩石定名等详简不同的记述,以及13块标本SiO₂、Al₂O₃、Fe₂O₃、FeO、MgO、CaO、Na₂O、K₂O、H₂O、H₂O⁺、TiO₂、P₂O₅、MnO的含量化学全分析表,18块标本的SiO₂、TiO₂含量对比,23块标本的Al₂O₃含量对比等半分析结果,7块标本经光谱半定量分析对元素Cr、Cu、Mn、Zn、Pb、Si、Y、Yb含量结果。其中提到:薄片已初步鉴定约70片,待鉴定50片,又补送数十块送去化学分析及磨制薄片。

令人想不到的是,早在1929年的

野簿中,他就由外文书籍抄录了7页(55种)岩浆岩的化学全分析成分表,1963年初稿袋中又抄录了15页(125种)外文岩浆岩的化学全分析成分表,作为对岩浆岩定名及进行成因分析的参考。这些残稿中已对该区岩浆岩分带做出初步判断。在“文革”中断十几年,1978年复职后,又得到岩石教研室刘金钊、杨慕华老师重新对补磨的薄片做出镜下鉴定,曾仲泽、杨博光老师完成了岩石成分的化学分析,父亲才对初稿做修改补充,于1983年发表在《地球科学》杂志上。由此可见父亲对写论文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做到了他对学生的嘱咐:“论文量不在多,但对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和范围,必须有所发现,并有明确见解,使后人从事同一范围的研究时,必须加以引用。”

同样,其他几篇先发表的总结文章,也得到精通某类古生物的同事协作,对各种动植物化石研究,定名和确定年代,还参考外国学者的资料,最后才建立了天山以北的两组地层标准剖面,探讨了该区的地壳运动史。尽力打下良好基础,不致误导后人,这是他的愿望。

1938年母亲携我们姐弟六人辗转香港,越南到达昆明与父亲汇合,又因1940年日本占领越南,昆明告急,西南联大将大学一年级迁往四川叙永,全家随父亲坐货运卡车,经贵阳、重庆,又乘江轮至泸州转小木船到叙永。1941年战况好转,返回昆明。几度搬迁,颠沛流离,1942年由昆明郊外回城内定居,我们姐弟四人正式进入联大附小读书,直到46年7月西南联大解散。那时年幼,只知道父亲忙于教学,大部分时间是带领学生野外实习和进行矿产调查,一出去就几个月或半年以上,还记得他讲过在野外考察中有意显示腰间佩戴地质罗盘和气压计的皮盒,并声称是手枪和子弹,以震慑土匪的暗探。有时他从野外回来,会带给我们几件岩、矿石标本,有手指大小的透明水晶晶体、易剥成表面平滑光亮菱面体的方解石晶体,有时是含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闪晶晶体的矿石,还有可剥成薄片的大片云母,都使我们爱不释手。也许就是这些无声的熏陶,我们姐弟四人偏爱理工,有三人在1952年后陆续考大学时,响应国家号召,报考了地质学院。

父亲一生博览群书,始终重视学校图书馆的建设,亲自张罗订购图书、杂志,充实馆藏。他常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内部影印书店为学院选购新书,自己也购买了不止。1978年后行动不便,改为圈注每期国内外新书预告,提供图书馆参考。因此他了解地球科学前沿动向,引导后辈跟上步伐,晚年还在助手的帮助下指导研究生。他一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掌握了很多地质资料,非常博学,人称活字典,很多人有问题都愿意找他,他也能给予让人满意的回答。

父亲在教书育人时,还十分关注国家的需要,随时投入到建设需要的艰苦的资源调查和研究中。抗战期间的1938年1月,应资源委员会要求,在湖南平江、桃源、常德、沅陵一带考察金矿,写成《湘东湘西五金矿视察报告》。1938年8月,资源委员会再次请他考察西康(现四川)的金矿,调查了盐边、盐源、木里、盐东、冕宁、会理、德昌、米易一带,这项工作持续了一整年,直到1939年8月他才回到昆明,之后写成三篇有关金矿的考察报告。1942年他又协助系主任孙云铸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成立云南地质调查所,全体教师积极参与矿产地质调查工作,服务社会,支援抗战。解放后,政府向世界宣布废除过去历史上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所有外国占领的租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父亲非常高兴也更加踊跃地投身新中国建设,向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和燃料工业部提供建议,参加多种地质学科专业会议,并参与了刘家峡、三门峡、三峡水库的工程地质考察等重大项目。

纵观父亲一生,为使饱受列强侵略的祖国能屹立于民族之林,他献身地质事业和教育事业60余载,勤奋严谨,以苦为乐,与同事们团结协作,尽力为后辈提供良好基础。六十寒暑,时代变迁,他看到祖国面貌日新月异,逐渐强大而欣慰驾鹤西去,堪称含笑期待后来人!

题图:袁复礼野簿,1929年,济木萨速写(局部)

陈曾寿(1878—1949),字仁先,自号耐寂、复志、焦庵,湖北蕪水(今蕪湖)巴河人。因家藏元代吴镇所绘松图《苍虬图》,故名其号为“苍虬阁”,所作诗汇为《苍虬阁集》,故又以“苍虬”之号为世所称。

陈曾寿曾祖陈沆为嘉庆二十四年状元,有《诗比兴笺》《筒学斋诗存》行世。祖陈廷经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累官翰林院编修、山东等道监察御史、内閣侍读学士等。父陈恩浦,科考颇踴躍。母周保珊,为漕运总督周馥之女,精书法。生长于簪缨之家的陈曾寿早岁颇有志气,少年时曾自诩为状元之才。举进士后,陈曾寿累官刑部主事、学部主事、广东道监察御史等。1911年以后,曾短暂在清华大学任教,后在杭州、上海,兼授徒、鬻诗文及卖字画为生。1924年以后,多居京津及长春,为溥仪服务。1947年至上海,1949年逝世,葬于上海漕河泾永年公墓。长子陈邦荣,又名陈微尘,是天津市长。次子陈邦直,字英三,有日记存世。

陈曾寿著述颇丰,著有《苍虬阁诗续集》《旧月移词》等,编有《旧月移词选》等,成就为世所称。其诗歌特点,钱仲联《钱学增所编《清诗三百首》引诸家之说,参以己意,有简明而公允的评价:

陈三立序《苍虬阁诗存》,谓“比世有仁先,遂使余与太夷之诗,或皆不免为侪父”。陈祖任序,谓其诗“出入玉溪、冬郎、山谷、后山诸家,以上窥探陶、杜,志深味隐,怒而不怒”。陈衍谓其兼“韩之豪、李之婉、王之道、黄之严”。盖自成为苍虬之诗,而不同于并世墨守宋人一派之诗人。集中咏松、菊以及游观山水之作,最称杰出。南湖诸作,足与俞明震争胜。辛亥革命以后所作,则多遗老之音。

诗歌之外,陈曾寿的词在近代文坛也颇有影响。陈邦炎《陈曾寿及其旧月移词》论其创作历程及艺术成就颇详。文中曾引诸家评述,如叶恭綽云:“门底甚大,写情寓感,骨影霏腾,并世殆罕俦匹,所谓文外独绝也”等,最终认为,陈曾寿词“自有其特出的意趣,独造的境界,其所开拓的词的审美领域,有并世及前代词家所未到者”。

尽管陈曾寿诗词成就颇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长期隐而不彰。很长一段时间,其著述并未得到有效整理。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张寅彭、王培军两位学者点校的《苍虬阁诗集》,汇编苍虬阁诗词及相关评论资料,予学界以很大方便。

事实上,陈曾寿还有规模较大的日记存世,惜乎学界此前多不知,因此极少利用这份珍贵文献。今藏湖北省图书馆的陈曾寿日记共25册,原稿次序颇为错乱,经湖北省图书馆工作人员细心整理,面貌始大致清晰。2021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了陈曾寿的这部分日记,收入《湖北省图书馆藏陈曾寿日记四种》中。现存日记记载的时段,自宣统元年(1909)二月初三日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月十一日,然中间颇有缺佚。各册名称不一,有作《苍虬阁日记》,有作《猛醒庵日记》等者。关于各册的基本情况及日记起止,张剑在《湖北省图书馆藏陈曾寿日记四种》一书《前言》中缕述甚详,且辨析第六册后半部分为陈曾寿女婿周君适(1903—1989)日记,兹不赘述。

因偶见曾君日记,陈曾寿慨然有效慕之心。其1909年9月16日日云:“见《曾文正公日记》石印本,字工整,无一笔潦草者,不禁感叹兴起。自今始,当以法为,若有间断,非人也。”或在陈曾寿立志订日记的影响下,陈氏家族形成了一个日记写作群体。今可考者,其弟陈曾矩(1884—1943)、陈曾任(1888—1960)、其子陈邦直(1910—1956)、其婿周君适等均有日记存世。

关于陈曾寿日记的价值,除张剑《前言》所述几点之外,还在于它揭示了陈曾寿的画家面目。陈曾寿一生所绘画作极多,早年曾印行《苍虬阁集》,以为鬻画张本。今观其日记,明确记载所绘画作已超三千幅。仅以雷峰塔为主题的作品,在1924年雷峰塔倒塌后的较短时间里,即绘制超过60幅。关于陈曾寿绘事概况,笔者另有《陈曾寿绘事年表》,读者将来可参看。

日记不惟记载陈曾寿作画事,还详载其绘画见解。如日记第三册云“吾学画时,所见天下之物皆山水也。所见之山水皆笔也。用笔有锋有骨有根有侧面,用墨始厚,用根始苍老,用侧面始尽其妙(近人画但用笔尖,唯乎笔尖)”,又言“凡诗文书画,一时有一时之风气,圈子风气者固不足论,卑视近代而高语汉魏,亦门外汉耳”。凡此论说,在近代画论中,足以占据一席之地。而陈曾寿的绘画造诣在当时也颇受认可。1931年3月,他曾与宝熙一道受溥仪之命,鉴定故宫书画89件,以便送日本展览。相关鉴定笔记,陈曾寿载于日记,这对研究故宫重要书画如米芾《天马赋》、管道昇《碧琅图》等的真伪及递藏情况,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另外,陈曾寿日记对研究近代围棋、武术等也有较高价值。陈曾寿弟陈曾刚(1882—1958)为近代武术大师,从著名拳师孙禄堂(1860—1933)、杨澄甫(1883—1936)受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等,后在上海成立致柔拳社,以授徒为生,从游者不下数千人。

苍虬阁日记中的近代文艺纪事

尧育飞

陈曾刚虽有《太极拳剑木答问》《八卦拳图》等武学著作行世,但其人日常生活及练武情形等,此前少有文献披露,而陈曾寿日记偶或一载,令人大开眼界。如1947年3月2日日记载:

黎志约为蝴蝶会,每人作菜二盘、点心一味。貽先、询先、七弟、邦叙侄女、邦勤侄女、邦德侄女、邦福侄女、邦刚侄女、祖定侄孙孙剑云(孙禄堂之女)、濮秩丞(七十八岁,甚健)及其女濮玉、炳树、瑛山、小坡、熊恩孝、刘承亨、陈玉奇、章国□、杨人镜外孙、芑孙之子绍曾,共开一席。……杨续后歌《独放》。瑛山拉胡琴牌子,濮玉琵琶独奏。章君凡阿林独奏。剑云舞剑。濮玉练太极拳。黎志弟与邦勤侄女对剑,复与玉奇对八卦合手。玉奇转八卦拳。

日记所载陈曾刚(黎志)召集的蝴蝶会,令人想见民国时期上海滩的文武盛会。其中所涉武学大师孙禄堂之女孙剑云、太极拳师陈玉奇(1926—2001)等切磋演练情况,则是近代武学研究的可贵资料。此外,陈曾寿日记还记载了太极拳的招式等。凡此,值得相关研究者留意。

至于围棋方面,陈曾寿日记所涉也颇多。如民国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日记载:

胡蔚老约观弈并晚饭,有林貽书及其弟四子□□,年甫十五,又有顾姓者年二十,与之对弈,顾姓,均后起之秀。尚有尹耀卿、姜鸣皋、王□□三人,皆上海棋会中之翘楚。吴乐山、喜孙、赵玉甫均作古人,回忆京华棋会之人,不禁凄然。今日之老军仅貽书一人。貽书为保全旧日名誉,不轻与人对局矣。

由此可见,陈曾寿在光绪年间,曾在京师组织棋会,声势颇大。许宝衡(1875—1961)《巢云移日记》民国二年四月初六日所记可证其事:

昔年仁先在京时,亦常作棋会,其时有定镇平、姜鸣皋、张耀山、赵玉甫、汪云峰、沈喜孙诸人,继有潘期东、段君良,现张、赵、喜孙均已物故,都下以弈名者,推汪云峰第一。君良为芝罘上将之子,受业于云峰,可以方驾。辛亥鼎革以后,陈曾寿虽未再组织棋会,但对围棋的关注并未终止。例如,日记载有1934年吴清源(1914—2014)在长春下棋的情况。这年7月12日日记载:“苏堪约陪吴清源,木谷在交通银行晚饭,予与木谷围棋一局,受五子,负八子半。裕斋与清源对局,亦受五子。”可补《吴清源回忆录》之阙。此外,陈曾寿作为主题的作品,在1924年雷峰塔倒塌后的较短时间里,即绘制超过60幅。关于陈曾寿绘事概况,笔者另有《陈曾寿绘事年表》,读者将来可参看。

总的来说,日记详细记载了陈曾寿以世家子弟经历辛亥鼎革,以遗民身份自处的人生历程。不过,陈曾寿在诗词、绘画等领域的成就,又使他在近代文艺占据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此外,陈曾寿的师友亲如张之洞、陈三立、沈曾植、梁鼎芬、陈宝琛、袁思亮、傅增湘、溥心畲、关锡之、赵朴初等人,又是近代史上的人物。由于这些缘故,陈曾寿日记的史学价值就不能被相关研究者忽视了。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